

西藏粮食生产与边防安全（1951—1965）

关浩淳

〔摘要〕 粮食生产关系社会民生，也影响国家安全。和平解放前，西藏高寒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生产技术，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造成粮食生产能力低下，过度依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影响到国家独立和主权。为扭转粮食短缺局面，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驻藏机关单位发起开荒生产运动，积极引介内地农业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西藏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于缓解内地粮食输入压力，保障西藏粮食供应，扭转边民在外贸中的不利地位，推动社会稳定、巩固边防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 西藏；粮食；生产技术；耕地；国防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22) 03-0181-07

民以食为本，粮以安为先。粮食安全不仅关系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影响着社会稳定、经贸发展和国防安全。西藏作为我国重要的边防前沿，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等地接壤，是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孔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长期以来，受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制约，西藏农业发展滞后，生产技术原始，粮食生产能力低下，不仅限制了人口发展，也制约着国防军事建设，影响到国家主权和安全。和平解放后，随着农业新技术、先进生产经验的引入，西藏粮食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可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边防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界关于西藏粮食生产的研究和论著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①，多是从农业或技术发展的角度开展讨论，对西藏近现代粮食生产发展史、新中国初期西藏粮食生产等问题鲜有专门研讨，尤其鲜有学者将粮食生产置于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特殊国际国内政治社会背景下，结合其与国家政治、边疆稳定的关系做深入综合考察。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社会历史调查、统计年鉴、方志报纸等资料，围绕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粮食生产及其对边疆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等问题，揭示现代粮食生产与国家政治、边防建设的重要关联，展示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党和国家巩固边防的努力。

一、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粮食生产、供应与边防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之上，农业带有典型的高原性特点。因海拔高、日较差大、积温少、地气寒薄等原因，西藏可耕地稀少，耕地（毛）面积约占总面积0.39%。^②从分布看，西藏可耕地集中于河谷地带，尤以拉萨河谷、年楚河谷、泽

〔作者简介〕 关浩淳，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福建 厦门 3610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城市发展与边疆社会治理研究（1949—1965）”（20CZS062）

① 王建林、陈崇凯：《西藏农牧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罗莉、拉灿：《西藏50年·经济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胡颂杰主编：《西藏农业概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等。

② 西藏自治区土地管理局编：《西藏自治区土种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当平原等地垦殖程度高，个别地区达90%以上，而广大高寒及峡谷地带，可耕地少。^①且因农奴逃亡，大量耕地被抛荒。例如昌都地区和平解放前，实际播种面积仅占当地总面积的0.5%，可耕地面积（含休闲地）占全区总面积的1%；桑昂曲宗80%以上耕地任其荒芜。^②农作物方面，西藏长期以青稞、小麦、豌豆等“喜冷凉作物”为主，青稞尤为普遍^③，几乎占全部农产品的7/10，小麦、大麦、豌豆、荞麦等作物“亦有出产”，但“为数甚少”，例如豌豆约占全部农作物的2/10，其他杂粮约占1/10。^④另外，西藏气候复杂多变，加之农业技术落后、水利灌溉困难，导致粮食单产低。据载，1952年西藏播种面积202.3万亩，粮食产量仅15.5万吨，平均单产80.3公斤，人均粮食135.1公斤；具体到拉萨、山南等传统农业区，单产一般仅四五十公斤；日喀则、江孜的上好田地，亩产不过七八十公斤，至于下等土地，亩产仅二十多斤，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来”。^⑤以种子与收获比折算，昌都土质好的地块是1:12—15，普通地为1:4—8；一般水地为1:4—8倍，旱地则是3—7倍。^⑥

西藏粮食产量低，长期难以满足人民需要，致使“一切食用物件，全赖外番”。^⑦和平解放前，吉隆每年从尼泊尔进口粮食30余万斤。^⑧和平解放初，西藏经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口岸每年进口粮食分别为105万千克、15万千克、10多万千克，其中1954—1956年从印度进口的大米、面粉年均200万千克左右。^⑨不丹的大米过去主要出口亚东和帕里等地，平均每年1000驮^⑩，即使在实施西藏粮食封锁禁运的1950年也有750驮；至于经阿里、亚东两地进口的粮食，据学者估计，每年约有3500多吨。^⑪阿里长期与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贸易，购买“青稞、大麦等食粮”和杏子粉（酸面）、杂食等，销售皮毛、盐巴以及野牛皮等土特产品。^⑫因粮食依赖进口，西藏长期缺乏商品定价权，在外贸中处于不利地位。以盐粮贸易为例，阿里的札达宗与印度贸易时盐粮比价长期为三驮盐巴换一驮大米或两驮杂粮，两驮盐巴换一驮荞麦面。^⑬有时甚至12换1，即12升盐巴换1升青稞，差价之大令人瞠目，即便如此，交易获得的陈粮还常被掺假。^⑭

粮食供应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西藏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就国内而言，一方面，增加了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难度。为解决粮食问题，中央军委调令14军126团与骑兵支队分别由云南和西北军区负责粮食补给，18军入藏所需粮食“以组织牦牛、汽车等运输为主”，部分在途中收买，“不足数则由西南空司负责组织空投及其他方法解决之”。^⑮粮食缺乏等困难导致解放阿里的骑兵支队，“一百五十人中大部分病倒”，“六十余人先后牺牲”。^⑯另一方面，造成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工作的被动。一些上层贵族企图封锁粮食向解放军施压，通过抬高粮价、限购粮食逼迫解放军撤离，甚至公开叫嚣“把解放军饿跑”。一些贵族不仅不执行帮助采购粮食的协议，还囤积粮食，散布禁止和解放军做买卖的谣言，造成物价大涨，“一个茶杯大的麦面馍（要花）两个银元”。^⑰在这种情况下，青藏、康藏公

①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3页。

②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4，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27页。

③ 罗莉、拉灿：《西藏50年·经济卷》，第51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 吴忠信 赵守珩 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198页。

⑤ 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第483—484页。

⑥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4，第28页。

⑦ 《卫藏通志》卷11贸易，《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 卫藏通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页。

⑧ 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⑨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粮食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⑩ 马驮一般载重50公斤，牛驮载重30—40公斤。见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粮食志》，第168页。

⑪ 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上，《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

⑫ 李贵明主编：《阿里人》续集，内部图书，2002年，第183—184页。

⑬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⑭ 李贵明主编：《阿里人》续集，第152页。

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⑯ 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5页。

⑰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西藏的变迁》，高全孝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102页。

路修通前,驻藏人员所需粮食多经印度转道亚东,运往拉萨、日喀则等地,仅1952年经印度转口的大米就有1250万千克。^①就国际而言,粮食缺乏,军事后勤难以保障,使得西藏解放遭到印度、美英国家的横加干涉。为阻挠西藏解放,印度动作不断,不仅实施“前进政策”,改组尼泊尔政府,派遣军队进驻交通要道^②;还封锁边境,提高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禁止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出口西藏,迫使我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让步,在1950—1962年多次发起贸易管制和禁运,给西藏贸易、民众生活、边防安全造成巨大威胁。^③

二、开垦荒地: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粮食生产面积的增加

增加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总产量的直接方式。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提出“生产与筑路并重”和“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方针。^④为此,驻藏人民解放军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组织生产建设师,掀起大生产运动。具言之,为贯彻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政策,人民解放军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太昭等地开垦荒地、发展生产。^⑤1951年11月,张国华将军等带领广大官兵发起“开荒生产运动”,要求凡有生产条件的驻地都要组织生产,积极开荒。为此,驻藏解放军抽调50%到80%的人力投入开荒生产,使春播蔬菜、粮食达到3000多亩。^⑥西藏军区还遵照中央提出的“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住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战略方针^⑦,召开生产节约会议,发出“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要求所有驻藏官兵每人必须开荒3亩,即使修路人员也不例外。

在开荒生产热潮的鼓舞下,从1952年2月开始,不到一年,解放军开荒14,000多亩,收获粮食10万斤。^⑧对此,扎西次仁回忆称,解放军努力“在河边湿润而松软的地方”开垦新地栽种粮食,还到拉萨街收集人和狗的粪便当肥料,他们的效率和干劲令人欣赏和佩服,相比之下,噶厦不仅“毫无效率可言”,还很腐败。^⑨大生产中,许多石头多、缺水严重、一片接着一片的荒原,被开辟成一块块适合种庄稼的园圃。从1951年冬到1954年冬,广大官兵垦荒6.1万多亩,收粮85万多公斤。^⑩蔡公堂区的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半”,还新修了水渠。^⑪哲蚌寺周边的沙滩荒地垦成良田,喇嘛们禁不住称赞:“我们住在这里多少年了,这片沙滩没有变样子,你们解放军来了才一年多,就把它变成良田了,使我们更爱家乡了”。^⑫在类乌齐县,军事代表处3年垦荒80余亩,产粮1200多斤。^⑬除恢复长期荒芜的土地外,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还带领人们开辟新地,1952—1955年垦荒25,107克。^⑭与之同时,除拉萨“七一农场”外,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还在林芝、山南、江孜、日喀则等地规划农场,农场数量从初期的1个增加到9个。^⑮拉萨“七一农

①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粮食志》,第106页。

② 张皓:《1949—1951年印度针对中国对尼泊尔实施的“前进政策”研究》,《史林》2020年第3期。

③ 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上、下,《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7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⑤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17、155—156页。

⑥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⑦ 陈明义等:《一片丹心 光照高原——怀念谭冠三同志》,《西藏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

⑧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第231页。

⑨ 扎西次仁口述:《西藏是我家》,杨和晋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⑩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201页。

⑪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西藏的变迁》,高全孝等译,第164页。

⑫ 魏克:《进军西藏日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⑬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⑭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4,第27页。“克”为旧西藏的计量单位,与现在的计量单位“克”(G)不同。西藏以青稞下种面积为计算土地单位,下种一克的土地亦称“克”,1克约等于1.6—1.7标准亩,在一江两河流域等农业发达地区约接近标准亩,在日喀则以西地区,1克(即目前统计上使用的1习惯亩)最大可达到15标准亩。另外,旧西藏量制未完全统一,克的容积不一,一般以能容28市斤(14千克)青稞者为计算标准;“克”含20赤(也有写作“升”“车”“批”等)。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1,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⑮ 黄可:《和平解放西藏重大事件实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154页。

场”的青稞种植面积从1956年119亩增至1959年500多亩，小麦从1956年112亩增至1959年550亩。^① 1952—1959年，仅“八一农场”就产粮175万公斤。^②

民主改革后，西藏旧制度被废除，人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他们敢于打破旧习俗，勇于尝试。噶尔昆萨、当雄、帕里、巴青等地群众将荒地辟为粮田，引水下山，种出第一代青稞或荞麦。过去主要为牧区的噶尔昆萨，民主改革中很多干部打破当地居民的顾虑，带动藏族群众开展生产。^③ 噶尔县的门士乡于1961年开始试种青稞并获得成功，平均单产达120.5千克。^④ 帕里全年最高温度16℃左右，最低零下20多度，无霜期只有70天左右，当地居民世代“全靠背运、帮零工和作小买卖维持生活”，没有一户种地，粮食“向来依靠其他地方供应”。^⑤ 平叛结束后，帕里人民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开荒种粮，1960年“开始小面积地试种青稞”，收获5000多斤粮食；随后扩大耕地面积，收获粮食39万多斤；除试种青稞外，还种植其他粮食作物，人均粮食增至200斤。^⑥ 民主改革后，察雅县烟多村农民在协会带领下“开垦出一百五十多克田地”，种出第一代青稞和荞麦。^⑦ 在平叛胜利后的亚东，赴内地学习归来的年轻人“效法内地人民种了试验田”，将噶厦和贵族占有的荒地开辟成农田。^⑧ 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要“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农业提到首位，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开展爱国丰产运动”，“专区和县的干部用粮为数不多，可以由当地解决。机关部队要种地、办农场，争取粮食部分自给，减少国家远程运粮的困难，并保证农民多存余粮”。^⑨ 随着人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西藏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如表1），由1952年245万亩增至1965年304.2万亩。粮食产量则由1959年1.8亿公斤增至1966年3.15亿公斤，增长75%，平均年增长8.3%。^⑩ 到1965年，西藏军区先后建起野马岗、达孜、拉孜、浪卡子、林芝、桑伊、米林、雪巴、察隅、易贡、米林等军垦农场，播种面积达14.6万余亩，产粮894万公斤，农业总产值476万余元。^⑪

表1 西藏历年末耕地面积变化表（1952—1965年） 单位：万亩

年份	1952	1956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年末实有耕地	245.0	250.5	251.4	277.9	283.0	291.1	291.7	295.4	304.2
水浇地	134.8	137.8	140.8	157.6	160.9	165.5	166.3	170.4	174.3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199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三、改进技术：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

运用先进生产技术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方式。长期以来，西藏农业生产力落后，生产工具原始。以昌都地区为例，该地农业生产“半数以上农具是木质”，工具主要有犁（以纯木质犁居多）、木耙、木勾等，即便如此，农具仍然缺乏。^⑫ 为此，驻藏解放军和机关单位努力引进新型生产工具，改进耕作技术与方式，发展水利灌溉和虫害防治等。具言之，和平解放后，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积极组织铁匠加工生产锄头、藏犁、镰刀等工具，鼓励群众采用新式步犁和小型农具代替木犁、木耙和木质的耒耜等落后工具。党和人民政府也扶助藏族群众添购农具，推动内地农具引入，教藏胞使用新式步犁，甚至无偿借贷、发放新式农具。尤其青藏、川藏公路修通后，农具等运输更为便利，汽车装载大量农具机械、种子、肥料等入藏。民主改革后，新型农具大规模推广。各级人民政府在民主改革中向农民发放“包括有新式

① 悦登平措、江华：《八载辛勤万山春——西藏八年成就等展览馆巡礼》，《西藏日报》1959年10月9日，第2版。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下，第13页。

③ 李韵倩：《千年土地翻了身》，《西藏日报》1959年11月19日，第2版。

④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噶尔县志》，成都：巴蜀书社，2013年，第669页。

⑤ 李蕾：《世界第一高城帕里试种庄稼获得丰收》，《西藏日报》1960年10月19日，第1版。

⑥ 少文：《帕里巨变》，《西藏日报》1965年8月18日，第2版。

⑦ 郭超人：《西藏十年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

⑧ 宫策：《亚东行》，《西藏日报》1959年6月23日，第2版。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第255—256页。

⑩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第200页。

⑪ 西藏自治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志·军事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345页。

⑫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4，第26、28页。

步犁等农具”在内的大小农具 90 万件。^① 民主改革后向农牧民“发放 70 多万件铁制农具”。^② 一些农场和居民还开始使用拖拉机耕作。随着新式工具的推广，波密地区新式农具占有量由 1959 年平均每户 1.5 件增至 1965 年 8 件；农村的原始木犁等生产工具到 1965 年“基本被取代”，耕作质量大大提高。^③

除运用新农具外，党和人民政府还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帮助群众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平解放前，西藏毁林开荒、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大量存在，“撂荒耕作制”“休闲耕作制”等粗放型轮耕方式仍然流行。^④ 面对这种情况，驻藏农业技术人员除引入内地耕作技术，向藏族群众传授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外，还指导驻地居民改革、废除原始耕作方式，倡导深翻多耕、积肥施肥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拉萨、日喀则、昌都的农业试验场工作人员经常帮助附近农民“选择品种”“改进耕作技术”。^⑤ 农业站人员还让藏族群众“参观试验田”，赠送新种子和秧苗，向他们演示如何耕地，怎样追肥浇水等。^⑥ 为提高民众生产技术，拉萨西城区于 1959 年 11 月举办农业技术训练班，培训农民农业技术，教育他们“使用新式农具”，介绍拉萨地区改良生产工具的经验，组织他们参加冬季生产，以达到“学习生产双丰收”。^⑦

为提高粮食产量，党和人民政府领导藏族群众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西藏多数地区降水少、雨季短，造成春旱严重，加之水资源分布不均，灌溉事业发展缓慢，民间经常发生“夺水”事件。塔工区的鱼龙真村有 600 多克肥沃土地，但缺水导致“94 克种子的土地常年荒芜”，下种常遭旱死，每到春天，农民为抢水打架，械斗伤人之事“不断发生”，甚至为此死人。^⑧ 和平解放后，西藏水利事业发展迅速，民主改革时期，根据“自愿互助”原则，广大农村掀起大搞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据统计，自 1959 年冬季到 1960 年春季，拉萨市等五个地区共修水渠 10,400 条，全长 5000 多公里，还采用土法，就地取材，兴建“1500 多个水库和水塘”，极大增加了灌溉面积，部分专区的灌溉面积达 90% 以上。^⑨ 在水利条件好的河谷平原，灌溉面积达 80% 左右，保证灌溉面积有 60% 左右；随着灌溉事业的发展，1961 年西藏有效灌溉面积增至 70% 左右，保证灌溉面积达 44% 左右。^⑩

党和人民还引进内地防虫除虫技术和粮食新品种。西藏群众一向不除治害虫，倘发生虫害，则认为是“天降灾难”，解决办法往往是“请喇嘛念经消灾”^⑪，部分地区直到民主改革前后，每遇蚜、红蜘蛛、金龟子、小蝗虫等病虫害，仍“无力抵抗防护”^⑫，极大限制了粮食产量提高。和平解放后，西藏开始使用敌百虫、DDT、六六六粉等药物杀虫，运用人工捕捉、灌水、撒烟灰等方法防治，使用磷化锌灭鼠。为彻底消灭害虫，拉萨等城镇周边农民大量使用药物，初步改变依靠“喇嘛念经”为庄稼保吉禳灾的思想，减轻了病虫害。为提高粮食产量，西藏还引进、试种、推广新品种。到 1959 年，从内地引入农作物 19 种、450 多个品种，个别地区筛选出青稞、小麦、豌豆、马铃薯等作物的优良品种。^⑬ 截止 1962 年，西藏大田作物已达 30 余种、2918 个品种，其中冬春小麦 774 个，青稞、大麦 726 个，其他杂粮 164 个。^⑭ 粮食单产量有很大提高。以冬小麦为例，1952—1954 年拉萨农业试验场成功试种冬小麦，又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引进 3007、丹麦一号、丹麦二号等品种，在拉萨、山南、林芝等地试种。^⑮ 后在海拔 3900 米以下农区大面积栽培，冬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合订本》第 1 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秘书处 1962 年编印，第 78 页。

②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 1 卷，第 213 页。

③ 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波密县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58、526 页。

④ 芒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芒康县志》，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第 120—121 页；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噶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噶尔县志》，第 347 页等。

⑤ 郭超人：《六年来的变化》，《西藏日报》1957 年 5 月 26 日，第 1 版。

⑥ 弗谢沃罗德·弗拉基米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1955 年西藏纪行》，张晓明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54 页。

⑦ 何云蔚：《学习技术 改进工具 发展生产：拉萨西城区拉鲁廓开办农业技术训练班》，《西藏日报》1959 年 12 月 2 日，第 1 版。

⑧ 冀文正：《六十多年的宿愿实现了》，《西藏日报》1958 年 3 月 7 日，第 1 版。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合订本》第 1 册，第 78 页。

⑩ 《西藏的农业概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年，第 3 页。

⑪ 《西藏的农业概况》，第 41 页。

⑫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藏族社会历史调查》4，第 31 页。

⑬ 陈广福等：《前进中的日喀则农业试验场》，《西藏日报》1959 年 10 月 13 日，第 2 版。

⑭ 王建林、陈崇凯：《西藏农牧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10 页。

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下，第 25 页。

小麦平均单产达 174 千克，高于全区粮食平均单产 11.4%。^①

四、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开展粮食生产的效应

荒地的开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善，促使西藏粮食总产和单产不断提高（如表 2），分别由 1952 年的 155,335 吨增至 1965 年的 290,725 吨，从 1952 年的 80.3 公斤/亩增至 1965 年的 109.6 公斤/亩。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对西藏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表 2 西藏个别年份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

年份	1952	1956	1959	1960	1965
粮食总产量（吨）	155,335	167,869	182,905	205,934	290,725
粮食单产（公斤/亩）	80.3	83.5	91.4	96.5	109.6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1993，第 238、243 页；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第 211 页。注：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据是按播种面积计算。

首先，西藏开展粮食生产减轻了内地粮食输入压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事供给，巩固了西藏社会秩序和边防安全。和平解放前，西藏粮食无法自给，严重威胁边疆稳定、国家安全。和平解放后，大量内地粮食运往西藏，西藏粮食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但造成巨大的物资运输压力。进军西藏期间，西南军区采购 1.44 万多头牦牛组成运输队，组织人员“从昌都东面、南面和东北面的兵站向昌都市区背运粮食数万斤”。^② 昌都在 1950—1954 年间“运输物资 3210 万公斤，出动牲畜 6.69 万多头，人力 1.56 万多人”。^③ 新疆向阿里运输粮食的压力也很大，据估计，运输和耗费比例约为 1:10。^④ 新藏公路修通之初，新疆军区成立“藏北运输指挥所”，负责从桑珠向阿里运粮，该所有“2000 多峰骆驼，1000 多匹毛骡，500 多匹马，还有一个汽车连，每年的开支超过了一个国防师”。^⑤

西藏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实现了后勤的部分自给，对于巩固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从 1960—1965 年西藏的粮食销售情况看，虽然内地粮数量仍然庞大，但在粮食总量中比例不断下降，由 1960 年的 30% 降低到 1965 年的 23%。^⑥ 位于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交汇处的米林农场，出产粮食多被运到其他地区，“供应整个西藏的部队和各单位职工”。^⑦ 1962 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西藏各地支援前线糌粑 117 万千克、马料 4.8 万千克。^⑧ 拉萨运送物资 213 万余市斤，加工支前糌粑 97 万斤^⑨，江孜支援糌粑 12000 多斤。^⑩ 正因如此，前线战士在“内地粮食运不上的情况下，仍可支持，没有饿肚子”。^⑪ 另外，为生产粮食安置退役军人和城镇青年，既解决了就业问题，稳定了边疆，又为国防军事提供了支援。对印反击战中，1886 名西藏农垦工作人员组成 14 个建制连队参与东部战区战斗，114 名人员立功受奖。^⑫ 可以说，粮食生产为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上层贵族叛乱、稳定秩序和打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维护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西藏开展粮食生产扭转了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不利局面，提升了西藏在边贸中的地位，保障了边疆经济安全。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商贸带有“半殖民地化”色彩，外商在进出口贸易中享有系列特权，英国、印度“操纵西藏进出

① 洛桑旦达主编：《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成立十周年论文选集》上，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第 193 页。

② 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第 56 页。

③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 203 页。

④ 李贵明主编：《阿里人》续集，第 66 页。

⑤ 李贵明主编：《阿里人踪影》，内部图书，第 291 页。

⑥ 数据比例依据资料计算。参见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粮食志》，第 209 页。

⑦ 西藏传媒集团编：《向老西藏致敬》，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02 页。

⑧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藏自治区志·粮食志》，第 44 页。

⑨ 中共拉萨市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中共拉萨党史大事记》（1951—1966），内部发行，1991 年，第 124 页。

⑩ 中共日喀则地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江孜地区党史大事记》（1950—1964），内部资料，1994 年，第 118 页。

⑪ 《深情的哈达——西藏回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5 页。

⑫ 洛桑旦达主编：《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成立十周年论文选集》上，第 193 页。

口贸易和对西藏原料的掠夺”。^① 西藏粮食供应受到外国控制，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和平解放后，在“精打细算、生产自给”政策的指导下，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扩大种植面积，采用先进农业技术提高产量。以日喀则农场为例，1953年建立时可耕地仅30余亩，到1959年增至500余亩；此外引进加拿大硬粒玉米、乌克兰冬麦等新作物、新品种。^② 可耕地的增加、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保证了西藏居民的粮食供应。20世纪60年代前期成立的澎波、林周两大国营农场，因拥有当地最好的生产设备，生产的小麦、青稞等“可以供西藏全部人口吃两周”。^③

粮食生产能力的增强，提升了西藏人民在边贸中的地位。据载，和平解放后，西藏工委组织运输面粉到阿里，鼓励开荒生产，改善了当地粮食供应状况，藏族群众在与周边国家的盐粮贸易中，将盐粮比例提高到“1升盐”兑换“6—7升粮食”，甚至更多。^④ 受中印关系恶化影响，双方曾围绕贸易开展“走私与反走私、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印度还利用粮食优势，采取切断边民粮源的做法扰乱阿里社会，据称，中印盐粮比价一度迅速由“二比一、三比一提高到五比一”。^⑤ 面对这种情况，我方在较短时间内从新疆和西藏其他区域调入粮食投放市场，使盐粮比价恢复到原来水平。西藏商贸逐渐摆脱外国控制，边疆经济安全得以保障。

最后，西藏开展粮食生产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西藏和平解放前，粮食有限，加之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农奴主操纵粮食、囤积居奇，造成粮价“时常暴涨”，每逢青黄不接，藏族群众只有求情送礼才能买到一点并不好的粮食；饮食结构上，只有贵族才能吃到大米、小麦，广大藏族同胞温饱难以解决，经常在“死亡线上挣扎”。^⑥ 西藏城镇乞丐、流民多不胜数，严重影响社会秩序。^⑦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族群众的平均粮食占有量不断提升，由1952年135.1公斤/人增至1965年213.9公斤/人。^⑧ 多数人吃上饱饭，“不少人家还存有余粮”，一些“乞丐乡”变成“幸福乡”。^⑨ 新作物、新品种的引入，农技推广站的示范、推广，扭转了西藏作物品种单一状况，作物种类由和平解放前的9种增至1959年的1000种左右。^⑩ 粮食种类的增加，推动了商品流通，改善了藏族群众的生活。拉孜居民开始将增加的粮食，由水陆两路运销日喀则等城镇和牧区，换回需要的生活日用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⑪ 噶尔昆萨长期依靠畜牧产品、食盐同周边地区交换粮食，和平解放后，随着交通的改善、粮食供应的增加，居民粮食占有量有所提高，丹增元旦一家用畜产品换了400斤青稞和大麦，加上当年收获的粮食，平均每人约有200多斤。^⑫ 粮食供应的保障，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刺激了城镇人口增长^⑬，对于稳定边疆发挥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西藏和平解放后，“开荒生产运动”的推进和农奴制的废除，激发了藏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量土地得到开垦。青藏、川藏公路的修通，西藏与内地的联系逐步加强，种子、新式农具、肥料等源源不断输入，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逐步推广，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西藏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为保障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改变当地在外贸中的不利地位，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谢科)

-
- ① 陈崇凯：《从商业外贸看英国侵藏后西藏地方经济的半殖民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上，第47—48页。
 - ② 陈广福等：《前进中的日喀则农业试验场》。
 -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西藏的变迁》，高全孝等译，第107页。
 - ④ 李贵明主编：《阿里人》续集，第152页。
 - ⑤ 李贵明主编：《阿里人》，第72页。
 - ⑥ 格来：《供应拉萨市民食粮需要 西藏贸总拉萨粮食门市部正式营业》，《西藏日报》1959年7月17日，第1版。
 - ⑦ 关浩淳：《消除贫困的努力——从和平解放到自治区成立西藏城镇的扶贫救济与社会治理》，《西藏研究》2021年第1期。
 - ⑧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218页。
 - ⑨ 汪士礼等：《噶尔新乡巨变》，《西藏日报》1964年2月9日，第2版。
 - ⑩ 悦登平措、江华：《八载辛勤万山春——西藏八年成就等展览馆巡礼》。
 - ⑪ 郭超人：《雅鲁藏布江边的拉孜宗》，《西藏日报》1957年12月4日，第2版。
 - ⑫ 李贵明：《昆沙区牧民用畜产品换回大批粮食》，《西藏日报》1961年8月22日，第2版。
 - ⑬ 关浩淳：《1951—1965年西藏城镇人口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